



# 论社会收益问题

□ 王东京

科斯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旨在证明经济活动存在负外部性时市场不会失灵。该文的核心观点今天被学界称为“科斯定理”，其完整表述是：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市场机制会将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于是负外部性得到矫正，市场不会失灵。

科斯定理无疑是对的。不过科斯分析的是负外部性，事实上，经济活动除了负外部性，还存在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形。当存在这种正外部性时市场会否失灵呢？科斯没有明确说。查阅相关文献，也未见哪位学者对此作过专门分析。这里我以《论社会收益问题》为题写文章，就是要讨论市场机制能否将社会收益内化为企业收益。如果能，那么实现内化的条件为何？

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而后者不会引发社会冲突。如某企业拟在某地建化工厂，工厂排污会给周边造成污染，倘若如此，居民就有可能抵制建工厂；但若某企业拟在某山区投资修公路，修公路不仅方便居民出行，还能带动周边土地升值，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修路。经济学家过去对正外部性关注不多，正是因为人们不反对这种有正外部性的投资。

我要指出的是，正外部性虽不会引发社会冲突，但并非没有相应的后果。可以推定，若某项目投资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此项目通常不会有企业投资。有一个现象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过去基础设施为何大多是由政府投资而非企业投资？学界有人解释基础设施是公共品，故需要政府提供。这说法显然不对。经济学定义的公共品是指消费不排他的物品，而基础设施的使用大多具有排他性，怎会都是公共品呢？

我的解释，企业不投资基础设施，真正的原因是投资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前不久我到西南地区调研，座谈会上有位县委书记说，他所在的那个县盛产竹笋，市场对竹笋也有需求，可大山里不通公路，竹笋运不出来，农民有钱赚不着。我问县里为何不帮助修路？他说县财政没有资金。我问为何不招商引资让企业修路？他说修路虽可增加农民收入，可山区车流量少，修路的收益不高，企业不愿投资。

是的，偏远山区地广人稀，修路的私人收益难免会小于社会收益。设



身处地想，你若是企业家，大概也不会去大山里修路吧？由此看，要鼓励企业家修路，就得设法将社会收益内化为企业收益，至少要让修路的收益不低于社会投资的平均收益。问题是如何才能将社会收益内化呢？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市场对此无能为力，唯一办法是政府对投资者给予补贴。

政府给补贴对刺激企业投资当然有效，但在我看来这并非唯一方案，也不是最佳方案。留心观察，现实中其实有大量通过市场将社会收益内化的成功探索。下面是几个不同类型的案例，让我对这些案例作分析。

案例一：2005年初，湖南双峰县委、县政府决定在老县城的外围扩建新城区。可当时政府财力不足，无力投资基础设施，于是拟引进省内“大汉集团公司”投资。大汉集团也表示愿意参与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但希望政府给予新城区部分土地开发的经营授权。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结果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新城区的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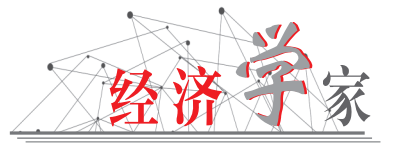
案例二：六盘水娘娘山普古乡，过去是典型的穷山僻壤，可近五年山乡巨变，今天公路已四通八达，基础设施一应俱全，2016年，农业旅游收入达到4亿元。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原来，当地企业家陶正学与农民联合成立了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陶正学用一亿投资基础设施，而农民用土地入股，共同将娘娘山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农业旅游产业园。

案例三：此乃学界众所皆知的例子。养蜂人住在苹果园旁边。蜜蜂可为果树授粉；果树可供蜜蜂采蜜，养

蜂人与果园主皆能享受对方提供的社会收益，故可以互不收费。问题在于：如果养蜂人与果园主所提供的社会收益不对等怎么办？底古认为此时市场会失灵，应由政府给受益少的一方提供补贴。而真实世界的处理是：受益多的一方会向受益少的一方付费。若不付费，是因为受益少的一方考虑到交易费用才未向对方收费。

读者也许要问，社会收益为何出现三种内化方式？我的回答，是正外部性投资所面对的约束不同。比如案例一，由于社会收益的受益人不确定，投资者若不能得到政府相应的经营授权，社会收益就无法内化。案例二不同于案例一，由于社会收益有确定的受益人，投资者便可与受益人进行股份合作，通过按股分红内化社会收益。而案例三又不同于案例二，由于两个投资者互为社会收益的受益人，则社会收益可互相内化。

最后让我总结本文要点：第一，经济学应该关注投资的正外部性，而解决正外部性的唯一法门是将社会收益内化为企业收益；第二，当社会收益没有确定的收益人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可通过相应的经营授权（如PPP模式）推动社会收益内化；第三，当社会收益有确定的受益人时，政府应引导投资者与社会收益的受益人进行股份合作，而且要保护产权，营造公平合作的投资环境。



## 全要素生产率

□ 毛 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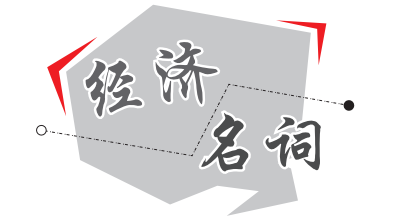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索罗余值”，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

到的残差。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打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所获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所赢得的稳定的资本报酬效应，已呈逐步递减状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告诉我们，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一味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提高劳动生

产率，也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瓶颈。

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必然要求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基础上，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导向，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技术结构等不断调整优化。另一方面要以体制创新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进一步创造“优胜劣汰”的充分竞争市场环境，让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 民营企业的“五新盼”

许多优质企业和有发展眼光的企业家对政策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降低成本等眼前的“等、靠、要”诉求，而是更多地期盼地方各级政府在帮助企业顺应市场形势抢占商业先机，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企业自身素质上出台新的政策。

一盼“大数据库”，地方政府在帮助民营企业顺应智能制造大势中给予扶持。当前，“中国智造”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热词。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的过程中，大数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企业而言，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必须针对客户的需求，体现产品供给的个性化，而这必须建立在基于客户需求的大数据库基础上。企业要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转变，就必须依赖于以工业化的手段、效率、成本制造个性化产品的智能制造模式。然而，建立基于客户需求的大数据库建设，对单个企业而言难度极大，只能期盼政府或行业协会主导。

二盼“抱团出海”，地方政府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给予民企更多协助。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许多优质民营企业已经有实力走全国化甚至全球化品牌发展路线。然而，民营企业与国企不同，“走出去”面临许多症结，比如法制风险、金融风险、市场信息风险等。许多成长期的中小企业更希望能够在政府主导下“抱团”走出去，实现跨区域甚至跨国界产能合作，拓展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外销通道。

三盼“人才动能”，地方政府在产业变革中加快新型实用人才培养。实体经济的基石是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具备工匠精神的专业人才。一方面，“千禧一代”正在逐步成为职场新生代力量；另一方面，创新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有效供给滞后于变革步伐，创新引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中低端一般劳动力供给过剩。许多企业认识到，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才越来越被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然而，依靠单个企业力量开展人才发掘必定力不从心，需要地方政府创造便利条件和政策环境。

四盼“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中配套服务要跟上。很多地处三四线城市的迁入企业表示，当企业从一二线城市迁来时，往往会面临“厂子搬走，人跟不过去”的困境。而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收入落差。对许多劳动者而言，好的生活配套环境也很重要。只有下大力气改善工业园区的公共配套服务水平，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让劳动者得到便利，才能使企业顺利实现跨区域转移。

五盼“涉企服务”，地方政府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要加力。与发达省份相比，诸多中西部省份在科技情报、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明显落后，许多大企业在当地建厂，而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设计、维护管理等继续依靠外地力量。同时，现有的一些涉企服务机构也时而暴露出高收费、低服务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增加了经营成本，迟滞了商业先机。

### 民营企业的“五常盼”

“五常盼”，主要是多年来企业一直存在的呼声诉求，但与以往相比，内涵又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盼继续“降成本”，其中降物流成本、金融成本、社保成本的诉求非常显著。物流成本方面，由于燃油、路桥等费用跌少涨多，致使物流费用呈连年上涨态势，一些依赖于物

流链的企业反映，近年经营成本中有三成左右为物流费用。金融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用工成本方面，除工资水平继续上涨外，一些地方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征收方式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盼继续“优环境”，其中解决政策信息“最后一公里”问题特别突出。一些企业表示，其对市场信息比较敏感，而对政策信息比较迟钝，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主动打听或相互交流，对政府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往往知之不全、知之不深。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期待地方政府设立惠企惠民“主动提醒”机制，让政策更加公开、透明，缩短政策到达时间，提高企业对优惠政策的承接力。

三盼继续“搭桥梁”，其中构建协同创新新机制的愿望日益高涨。许多企业反映，由于体制性原因，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在协同创新平台上，始终难以达成比较一致的目标导向，缺乏规范的合作共赢机制，研发专利成果与投产达产之间，也欠缺有效的信息互通桥梁。广大企业更希望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探索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新路子，打通政产学研用、政企金之间的通道，大力强化科技同经济的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的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的对接，加快构建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新机制。

四盼继续“惠金融”，其中优化民营企业征信平台建设的呼声尤为期待。与国有企业可以获贷银行提供的时限较长、利率较优惠的固定资产贷款相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从银行获得一年一贷的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必须先还全部还清才可以续贷，给企业增添负担。许多企业只能依靠地方政府提供的过桥资金，甚至高利贷缓解燃眉之急。许多优质和潜力企业表示，希望地方政府加快完善征信平台建设，金融机构真正给予民营企业国民待遇，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品种的金融服务。

五盼继续“治侵权”，其中整治知识侵权的呼声极为强烈。一些企业反映，其研发设计动力不足的外部原因，往往是由于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力保护。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其并不掌握核心科技，更多的设计创新主要体现在配方改良、外观设计上，这些投入大量人、财、物取得的原创成果，投放市场不久便被同业模仿甚至超越，向政府部门投诉反映也大多无果而终，影响了企业进一步研发的积极性。

### 地方政府的因应之策

民营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的新时代，关键是要破解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大难题，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优化政务服务，改善民企经营环境。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一方面，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着力破解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营造法治、公平的市场环境，保障民营企业经营实现规则、机会、权利“三平等”。要以“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加快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着力消除显性或隐性门槛，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

攻克融资心结，畅通民企经营血脉。针对多年来始终困扰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和商业银行不敢放贷的心结，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要尽快开展民营企业信用数据库建设和信用评级。规范融资中评估、审计、保险、登记等金融中介服务收费，构建政府主导的融资担保体系。推进多层次资本市

# 民营企业的「五新盼」「五常盼」

□ 廖清成 许立

场建设，稳步发展“新三板”市场，规范新型互联网金融业态，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要推动银行培养科学理性的信贷风险容忍度，打造风险管理核心竞争力。要引导商业银行加快转变经营和服务理念，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建立符合民营企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激荡经营活力，引导民企创新管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应该靠自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需作为。一要大力搭建“双创”平台体系，打造“双创”技术平台，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申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加快推进民企创新成果转化。二要实施民营企业智能化提升计划，着力帮助有前景的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购销经营和制造服务等环节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三要协助民营企业开拓市场，着力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区域名牌，全面带动提升民营经济的产品档次、品牌和发展规模。四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管理理念和方式，加快实现企业自身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